

学术顾问：吴晓铃 刘贯文
封面设计：��毓葵
责任编辑：孙耀中 赵伸
特约编辑：贺大龙 刘海兰

395

《西厢记》鉴赏辞典

贺新辉 朱捷 编著

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测绘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 14.5 印张 510 千字
1990 年 5 月北京第一版 1990 年 5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6100 册
ISBN7-80016-223-0/I · 75

(京)032 号

定价：9.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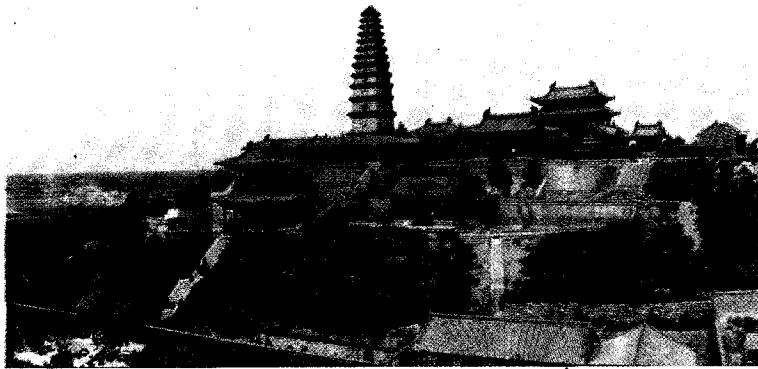
三晋文化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总 编 赵雨亭

副总编 刘舒侠 刘贯文

李玉明 刘 江

陈墨章 张 颀



普救寺全貌



山门扁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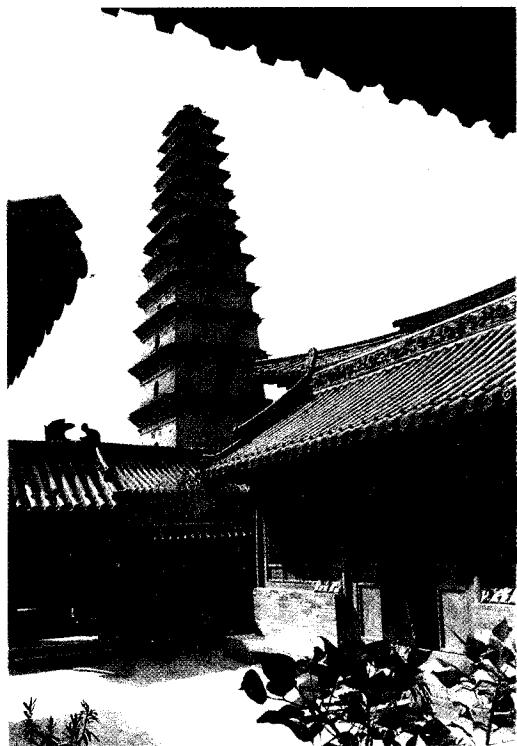
梨花深院

(崔夫人一家老小在普救寺的住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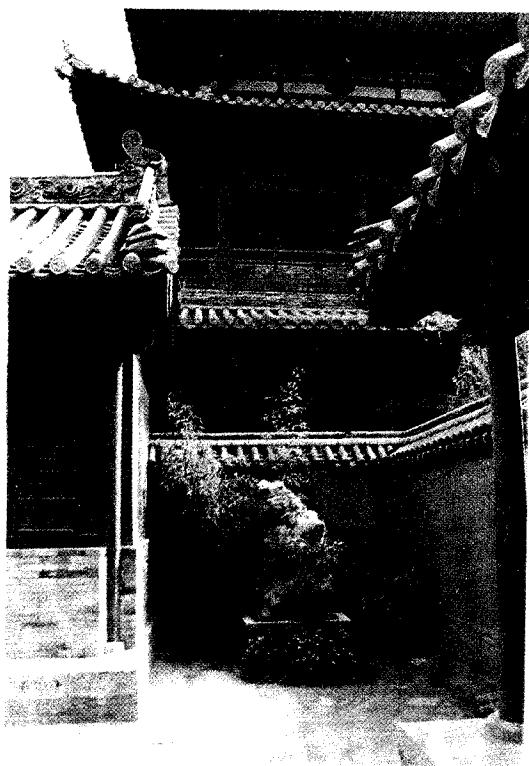
东邻书院

(白马解围后老夫人请张生住的“书院”在
梨花深院东边，与西厢只一条夹道之隔)



普救西厢

(梨花深院内的西厢房，莺莺住
在此房，即“待月西厢”之处)



夜跳东墙

(张生应约夜跳之东墙)

(以上均系谷威摄影)



普救寺金·泰和甲子(1204)莺莺故居词碣

(全毅 摄)



明弘治十一年(1498)金台岳家重刊本

《奇妙·全相注释西厢记》书影

凡例

一、本书编著的目的是为了帮助读者阅读和欣赏《西厢记》，解释书中的疑难问题并增长有关知识。

二、本书在《西厢记》每一本的每一折（包括楔子）原文后面附一篇赏析文章，即是一个词条；《前言》对《西厢记》成书过程、艺术价值作了全面评价。前言与各折赏析文章、附录部分合起来，即是一部完整的评赏《西厢记》的论著。

三、本书所录《西厢记》原文，以王季思校注本，即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本为底本。个别地方如有异文，则择善而从之。

四、本书文内所写《西厢记》即王实甫所著杂剧《西厢记》，提到金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时简称《董西厢》，以示区别。

五、本书在正文之后，于附录部分，介绍了《西厢记》作者王实甫，《西厢记》版本，宫调、曲牌，方言、俗语，它的渊源——元稹的《莺莺传》、秦观、毛滂的《调笑转踏·莺莺》、赵德麟的《商调蝶恋花鼓子词》、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以及历代名家对《西厢记》的评论。国内外研究《西厢记》的资料索引，《西厢记》与普救寺，《西厢记》名句、佳语索引等，以方便读者查检阅读。

六、本书在正文前附录了一组《西厢记》崔、张爱情故事发生地——山西省永济县普救寺的彩色照片，书中每一折选录了一幅明代各种版本的插图，供读者欣赏。

七、本书在编撰中吸收、借鉴了王季思、吴晓铃、霍松林、祝肇年、蔡运长、张燕瑾、弥松颐、蒋星煜等前贤的研究成果，特此说明并致谢！

前　　言

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是我国古典戏剧文学史上的不朽名著，它以其光辉的主题思想，精美圆熟的艺术技巧，优美典雅的独特风格和隽拔通俗的文学语言著称于世。它如同我国文坛艺苑中的一颗璀璨夺目的明星，吸引着世世代代的观众与读者，震撼着他们的心弦。在我国，崔、张的爱情故事家喻户晓；《西厢记》的许多佳词丽句脍炙人口；改编、上演、学习、研究《西厢记》之风日盛一日。目前，随着崔、张爱情故事的发生地——山西省永济县普救寺的重建复原，在全国将会掀起一个学习、研究《西厢记》的更大热潮。为了帮助广大青年读者深入理解这一古典名著，我们编撰了这部鉴赏辞典，对《西厢记》的五本二十一折连同四个楔子，逐一进行了赏析。这一篇篇鉴赏作品，分开来看，是一个个词条；合起来看，加上这篇前言和附录，又是一部研究专著。在辞书正文之后，附录了作者传略，版本、宫调曲牌、方言俗语介绍，名句佳语索引，以及《西厢记》的渊源——《莺莺传》、《调笑转踏》、《商调蝶恋花》、《西厢记诸宫调》，荟萃了我国《西》学研究的丰硕成果，是当前研究元代杂剧与《西厢记》的一部必备工具书。

崔莺莺与张生的爱情故事，从普救寺当地民间流传的一些传说看，最早产生于民间。这些民间传说，是寄同情于崔莺莺的。这位相国千金、名门闺秀，随母扶父灵柩返回故里，路居普救古寺。对她来说，按礼教的要求，是不能有什么爱情念头的，何况重孝在身，连父母包办的与郑恒的婚约，也不得不按制推期。不料，在普救寺里与张生邂逅相遇，二人竟一见钟情。张生赁居西厢，借故搭斋，毛遂自荐，墙角吟诗，道场传情，搬兵解围……，婀娜多姿的莺莺，倾心于张生的才貌，默默依顺地接受了张生的爱情。由于二入门第悬殊，张生身份低微，不

得不赴京应试。莺莺忠于张生又不放心张生，心里不愿他离开又无法使他不离开；不满母亲“逼试”，又阻止不了张生去赴试。不料，张生应考得中，一步登天，从白衣秀士一跃而为玉堂人物，他却喜新厌旧，竟抛弃了莺莺。当地人一代一代地传说着这个美妙动人的故事。老人们每每讲到这个故事，总是要掉泪的。他们把普救古寺叫莺莺寺，古塔叫莺莺塔，古寺下大道沟里的细沙，也叫做莺莺沙。在普救寺东南方的中条山脚下，竹林中的许许多多斑竹，人们说那点点斑痕，便是莺莺的泪痕，把这种竹子也叫做“莺莺竹”。游人们每游古寺，在古塔下击石，塔上即有蛙鸣声，人们称之为“莺蛙叫”。可见好心的人们，对这位容貌俊美、心地善良的相府闺秀的爱怜、同情之心是多么深厚！

崔张爱情故事最早见诸文字的是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莺莺传》又叫《会真记》。在这篇爱情小说里，张生是一个无行文人，他迷恋于莺莺的美貌而对她百计追求。但是，当他骗取了莺莺的爱情，使莺莺失身于他之后，却又负心背义另娶高门，抛弃了莺莺。后来张生又要求相见，“崔终不出”，“竟不之见”。写诗一首赠张生：“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明白无误地道出：是你抛弃了我，那么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但是，当时是你自己亲近我的。请将你过去对我的那种情意，去爱你现在的爱人吧。哀中有愤，怨而不馁。在小说的末尾，作家借人物之口的告白却与形象本身是矛盾的：对于“始乱之，终弃之”的张生，不仅不视为轻薄残忍，反而认为他是“善补过者”。正如鲁迅所说：“文过饰非，遂堕恶趣。”（《中国小说史略》）这就告诉人们，和莺莺对立的已经不是她原来的情人张生，而是整个封建社会。是那个冷酷虚伪的上层社会与封建礼教，撕裂着美好的东西，制造了这出爱情的悲剧！唯其如此，这篇传奇小说产生了与作家主观意图大相径庭的社会效果：人们喜爱莺莺，同情莺莺。在读者的眼里，莺莺不是什么“不妖其身，必妖于人”的“尤物”，而是一位端庄娴雅、感情真挚，热烈追求真正爱情生活的美丽少女。

《莺莺传》女主人公独特的悲剧命运强烈地拨动着人们心灵的琴弦，加上它那简约明澈、清新秀美的文字描述，浸透着一种深情柔和的诗意，因而，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崔、张的爱情故事，不胫而走，广为流传；以这一故事为题材的各种文艺演唱作品，纷纷出现。目前还存传于世的有秦观、毛滂的《调笑转踏》和赵德麟的《商调蝶恋花》。此外，还有南宋皇都风月主人《绿窗新话》中的小说《张公子遇崔莺莺》。这些作品在歌咏崔张爱情故事的同时，对于张生“弃置前欢”的薄情行为进行了批判。说他是“薄情年少如飞絮”（毛滂），“最是多才情太浅，等闲不念离人怨”（赵德麟）。都表现了进步的创作倾向。

但是，真正使崔张爱情故事由情节到主题都发生了质的飞跃的，是金人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即《西厢记挡弹词》）。

诸宫调，是宋金时期由泽州（今山西省晋城市）民间艺人孔三传首创，广泛流传在我国北方的一种有说有唱、以唱为主的民间文艺形式。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简称《董西厢》），结构宏伟，是现存诸宫调中唯一最完整的作品，是那一时代民间文艺最杰出的代表。在这部作品中，除说词外，共用了包括十四种宫调的一百九十三套组曲。作者在蝉联而下的组曲中，做了精心结构。从而，将崔张爱情故事，由不足三千字的《莺莺传》扩展为五万余字的说唱文学作品，使之在主题思想、人物形象、艺术结构、语言特色等方面，都呈现出崭新的面貌。作品用交叉描绘男女主人公的方式，表现两人在相爱过程中的性格发展。在《董西厢》里，改变了张生负心人的形象，温柔美丽的莺莺也不屈从于命运的摆弄，形象更加丰满。作品用崔张二人共同追求幸福爱情的动人故事，取代了《莺莺传》“始乱终弃”的悲剧结局，最后二人双双出走，成就了美满婚姻。这样，就突出了崔张故事争取婚姻自主、反抗封建礼教束缚的光辉主题。在这里，莺莺同张生一见钟情；白马解围使二人的心更加贴近。于是，在红娘的撮合下，他们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由相互倾慕，到月下私合；用既成事实迫使老夫人承认了他们的

亲事。可是，当张生告别莺莺赴京赶考得中探花时，郑恒却前来谎称张生已改娶卫尚书家小姐为妻，老夫人一怒之下，“阴许恒择日成礼”。待张生赶到，木已成舟，二人便以“悬梁自尽”表示抗议。幸得法聪和尚与红娘及时救下，二人才双双出奔，投于白马将军处团圆。郑恒赶来投诉被斥，投阶自杀。至此，张生、莺莺成就了美满姻缘。复杂多变、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委婉、细腻的人物形象的刻画，叙事、写景与抒情相结合的环境氛围的艺术描绘，以及秀丽自然，“字字本色，言言古意”的文学语言，使《董西厢》成为我国“古今传奇鼻祖”（胡应麟语）。《董西厢》的出现直接影响了杂剧《西厢记》的产生。但是，“以出奔作为团圆的手段，只能是作者的一种幻想，是不见容于封建制度的，因而，实际上也是行不通的，不可能达到团圆的目的”（张燕瑾、弥松颐《西厢记新注》前言）。其次，在故事情节的安排上，也有轻重失当、过分芜杂等不合理的地方；有些人物的性格不够完整等。因此，对于广大读者来说，也还不尽如人意。这些又为王实甫创作杂剧《西厢记》留下了广阔的驰骋天地。

杂剧《西厢记》正是在《莺莺传》出现以来的许多描写崔、张爱情故事的文艺作品，尤其是在《董西厢》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一部伟大的古典现实主义杰作。对于描写崔张爱情这一题材的文艺作品，由《莺莺传》到《西厢记》的转变与飞跃，正如宋之的在《论〈西厢记〉》一文中所指出的：

元稹的《莺莺传》是悲剧：是残酷的封建社会生活里的、一首被任意侮辱和弃掷的女性的哀歌。王实甫底《西厢记》是喜剧：描写了封建时代的一些青年男女，为了自由、幸福和生活的权利而敢于和传统的封建力量进行搏斗的、充满了曲折但也充满了痛苦、胜利和喜悦的一篇宏伟的诗篇。如果说《莺莺传》的艺术力量，在于元稹通过莺莺这一美丽而悲惨的封建社会里的女性命运，唤起我们的同情、惆怅和哀挽。而《西厢记》的艺术力量，就在于王实甫以辛辣的讽刺，火一样的嘲笑，尖锐的指责，抨击和烧毁了看来是强大无比的封建统治阶级底封建观念和封建力量。元稹站在封建统治阶级底立场上，看出了封建统治力量的可怕、可恨和可憎；王实甫却站在封建统治阶级底叛逆者

立场上，勇敢地描写了封建社会的两种力量，即传统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力量和渴望突破这种罪恶的力量的青年一代的严重的搏斗和深刻的冲突。王实甫的《西厢记》，充满了叛逆者的声音。王实甫鲜明地倾向青年一代，热烈地歌颂了敢于向封建力量进行突击的青年一代。

确切地分析出由《莺莺传》到《西厢记》这一飞跃的实质，深刻地指出了杂剧《西厢记》反对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伟大主题。如果说，由《莺莺传》到《董西厢》完成了一个质的变化，而《西厢记》对于《董西厢》则是全面的深化与完善。《董西厢》将《莺莺传》由悲剧结局改为团圆结局，但还没有使崔张故事演绎为喜剧；《西厢记》则在《董西厢》的基础上，从故事结构和人物塑造方面，充分挖掘喜剧因素，构成了一部著名喜剧。王实甫以其“纵横烂漫，出入变化”的大笔，将崔、张故事升华到出神入化的境地。因此，《西厢记》一出现，就如异峰突起，在我国古典戏曲乃至整个古典文学创作领域矗起一座高峰，赢得了“天下夺魁”的美誉，连它借以脱胎的《董西厢》也为人们所淡漠了。其后，虽然有不少作家仍试图描写这个题材，但不是摹仿改写，就是笨拙的续貂；不仅没有能取代《西厢记》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相反，倒将它陪衬得更加光彩夺目，不可逾越！因此，它使历代许多思想不同、地位各异的文人们一致为之倾倒，有的称赞它是“化工”之作，是“出于童心”的“天下至文”（明李卓吾《焚书》）；有的则说它是“无所不工”，“以神以韵”的“神品”（明王骥德《曲律》）；有的说它是“北曲压卷”之作（明王世贞《艺苑卮言》）；有的评它是“南北杂剧之冠”（明徐复祚语）；有的说它是“词曲之关雎，梨园之虞夏”（程巨源《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序》）；有的说它是“超时空”的艺术佳作（郭沫若《西厢记艺术上之批判与其作者之性格》）；有的则将它与古典小说《红楼梦》合称为“中国古代文艺的双璧”（赵景深《明刊本西厢记研究》序）；有的称赞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可以“凌驾于元、明、清三代任何一个处理同类题材的剧本之上”（董每戡《西厢记发覆》）。

那么，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在崔、张爱情题材的创作

中,究竟有哪些重大的突破,在艺术上又有哪些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呢?

造成《西厢记》艺术生命不朽的原因,首先当然是它“现实主义的真实性”,透过爱情故事的描写,在《董西厢》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崔、张故事反封建的主题,赋予作品以时代精神。

《西厢记》产生在我国封建社会金末元初的动乱年代。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曾精辟地揭示了封建婚姻制度的实质,指出:“结婚乃是一种政治行为,是借新的联姻以加强自己势力的机会。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绝不是个人的意愿”,所以,“婚姻的缔结”,“是一种由父母包办的事情”。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在婚姻问题上,始终存在着以门第财产和家世利益为转移的父母包办和本人自主的矛盾。这种封建婚姻制度,完全排斥男女双方表达爱情和自主婚姻的权利,是造成无数爱情、婚姻悲剧的主要根源。蒙古族入主中原之后,一方面,“有一些所谓名儒投奔蒙古人,献上典章礼乐制度三纲五常等统治中国的儒学”(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元人则继承有利于其统治的封建礼教,并与佛、道结合,用封建礼教统治并麻醉人民;另一方面,元人对汉人和其他民族实行野蛮统治,赤裸裸地掠夺、买卖、蹂躏妇女,惨状目不忍睹。人的尊严被摧残毁灭,人的思想感情受到最沉重的压抑。《西厢记》的意义,正是在于它尖锐提出和真实反映了封建社会普遍存在的、牵动千家万户的、于元代更加突出的一个社会问题:青年男女追求爱情自由、婚姻自主与封建礼教婚姻制度的矛盾。这个主题,在《西厢记》里,象一条蜿蜒的细流,九溪十八洞,曲曲弯弯,跌宕多姿,岸花明媚,细浪湍激,魅力动人地歌颂了青年一代为争取幸福爱情与自主婚姻而忘餐废寝、坚定不移的斗争精神。剧中的男女主人公张生、莺莺,月下私期,是那么的欢畅欣喜,有情有义;他们的长亭离别,又是那么的悲凄缠绵,难舍难分,使古今读者为他们这种美满爱情所感动、所陶醉。最后,剧本通过张生之口,发出了这